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

徐拥军 闫 静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档案学先后经历了探索期、发展期和创新期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厘清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学科内核和学理内涵,是保持学科独立性、提升学科话语权、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必需之举。本文结合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内容,总结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四个基本范畴及其十六个核心命题,并阐释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四个基本范畴中,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是学科的逻辑起点,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是学科的立足之道,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是学科的生存之基,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总结归纳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有助于更新和延展学科内涵,使档案学以全新的面貌立足于学科之林。图 1。参考文献 42。

关键词 档案学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基本范畴 核心命题 中国特色

分类号 G270

The Basic Categories and Core Propositions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U Yongjun, YAN Jing

ABSTRACT

Since its birth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xperienced exploration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innovation period. In this process,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ubject core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to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e, enhance its discourse power and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content of archival scie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basic categories and its sixteen core propositions,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tegories.

First, among the four categories, the nature and formation law of archives a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discipline. Clarify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formation law of archives is the basis for carrying ou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rchives practice, and it is also the premise to maintain disciplinary uniqueness. The core propositions include the definition of archives, the law of natural formation of archives, the unique form of archives value, and the regularity of the realization of archives value. Second, the design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core link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are the basis of the discipline. Archives management has gone through ent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ages. In the three stages, archives management link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ir

通信作者:闫静,Email:jingyan@sdu.edu.cn,ORCID:0000-0003-2436-0804(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N Jing,Email:jingyan@sdu.edu.cn,ORCID:0000-0003-2436-0804)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core propositions include the division of the core link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the roles and requirements of archives filing, class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appraisal, and utilization. Third, the research of archives undertaking and its social service are the basis of the discipline's survival. Since 1950s,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has undergone four major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es undertaking have been formed. The core propositions include the goal of archives undertaking according to rule of laws,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of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the foothold of archives social services, and important parts of archives undertaking. Fourth,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chival science are the source of the discipline's vitality. Since its inception,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mphasized independence, sinicization and autonomy in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hinese archival community has absorbed, developed and improved western archival theory,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core theory and metho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propositions include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sciplinary features, the innovation of existing theories and origin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sum up the basic categories and core propositions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helpful to renew and exte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make archival science stand in the forest of the subject with a new look. 1 fig. 42 refs.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Basic categories. Core proposition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0 引言

我国档案整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意义的中国档案学源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转型和学术发展,并随着史学、行政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对历史档案整理、公文书式改革、文书处理增效等问题的研究而逐渐发展^[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学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档案工作实践,最终进化为一门独立且渐趋成熟的学科——中国特色档案学^[2]。中国档案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实践所形成的,并能够反映档案现象和档案规律,指导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综合性档案学学科体系”^[3]。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学理性与政治性等学科特质,已经屹立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林。

纵观时代变迁、社会变革、实践发展、学科演化、理论更新等因素,新中国的档案学大体经历了探索期(1949—1977 年)、发展期(1978—1997 年)、创新期(1998 年至今)三个阶段^[4]。第一阶段是档案学的独立化建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国家档案事业、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的问题,第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在反思性吸收民国时期档案思想与批判性借鉴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基础上,于 1951 年创办第一份正规档案学术刊物——《材料工作通讯》,1952 年创建第一所正规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1954 年举办第一次全国性档案行业会议。1956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档案学成为所列 16 个独立学科之一,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属性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第二阶段是档案学的科学化建构时期。为响应改革

开放的国家政策、恢复与重建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档案学人开始从“学科自觉”“方法自觉”“学术自觉”角度思考中国档案学的科学化建构问题。一是对档案学“学科性质”进行反思,在“社会科学说”“应用科学说”“管理科学说”“综合科学说”与“交叉科学或边缘科学说”^[5]等争议中,明确了档案学的管理学学科归属。二是对档案学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在“档案学有无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及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等争议中^[6],明确了档案学的方法论体系^[7]。三是对档案学学理性与实践性进行梳理,在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档案学的学术性与应用性之辨、社会对档案学的学科偏见等问题的思考中^[8],明确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学术内涵。第三阶段是档案学的“新话语”建构时期。为面对新世纪社会变迁和信息化转型,档案学在变革与创新中不断拓展学科边界、进行新的话语建构,完成了从自觉到自强的转变。电子档案管理、档案信息化建设成为新兴领域,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成为重点领域,档案与其他学科融合带来的档案理论革新成为创新领域。档案学在学科体系延展、学术体系创新、话语体系建构中保持发展活力,并不断孕育学科新生。

中国档案学在学科演进过程中也经历了发展困境甚至危机。第一次“有学与无学”危机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的独立化建构阶段,聚焦于中国档案学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辩;第二次“原有理论与改革实践矛盾”^[9]危机发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的科学化建构阶段,聚焦于档案学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第三次“生源危机、研究方法论危机、研究成果危机”^[10]发生于新世纪之后中国档案学的“新话语”建构阶段,聚焦于中国档案学的社会公认度与成熟度问题。这三次危机并非历时相续的,而是共时同存的,只不过在学科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同而已。但危机中孕育新机,变局中开拓新局。中国档案学于“独立性之争”中排除争议,力求发展自身独特的学科体系;于“科学性之争”中守护底线,力求发展自身科学的理论体系;于“自主性之争”中捍卫主权,力求夯实自主的话语体系。而在学科发展危机中,破解危机并指引中国档案学保持学科特色、实现学科不断创新发展是其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为此,明确中国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揭示学科内核和学理内涵就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贯通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时代之维、理论之思与实践之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思考与总结其内蕴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一则推动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发展与革新。恩格斯曾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1]凝练中国特色档案学的核心问题,有助于明确学科的性质、地位与旨归。二则推动中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认同。学科内核塑造学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品格,审思中国档案学的核心问题有助于档案学人以学术自觉和主体性意识自塑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则推动中国档案学树立学术自信。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唯有梳理盘点、检思展望本学科特性与治学之长,方可厚植自身的学术根底,开掘学术遗产,树立学术自信。

1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概要

基本范畴是对一个学科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研究问题的高度抽象和浓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科发展的本质,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彰显出一门学科特色的最重要研究内容。命题既是基本范畴衍生出的表示判断的语句,也是陈述基本范畴内观点的语句。“基本命题应当拥有两种特性:①它必须是由某个可感现象引起的;②任何其他命题必须不能与它相矛盾。”^[12]在海德格

尔看来,命题被视作真理的处所,是解释的样式、领会的变体、存在的蜕变,科学的命题是存在之真理的一种派生方式^[13]。核心命题是一门学科核心知识的表达,是基本范畴的精确性和细化阐释。由此,基本范畴和核心命题相互交织、相辅相成,二者共同绘制了一门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蓝图,揭示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架构。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应能揭示档案及档案现象的本质规律,核心命题应能凝练档案及档案现象的精确表达。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档案有别于其他文献、信息的特质,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档案工作实践土壤,围绕档案学学科演进过程中凸显出的“历史”“管理”“信息”三重属性,最终以促进档案学学科专业化为发展指归。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档案学在学理层面实现了从“理论本土化”到“本土化理论构建”的转型,在方法层面实现了从单纯的“借鉴与移植”到自主的“多学科融合”的转型。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相关概念、体系及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方法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思想。

基于对中国档案学学科历史和发展脉络的认识,本文提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四大基本范畴: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档案学理论与方法,并结合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十六个核心命题。其中,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立足之道,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生存之基,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

2 基本范畴一: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

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对其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本质属性是事物的内在特有性质,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厘清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也是档案学保持学科独特性,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前提。“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以组成它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为客观基础的。”^[14]从历史角度看,档案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档案由萌芽到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古代的结绳、刻契记事是档案的雏形和不成熟阶段,文字、国家的相继出现,则为档案的产生奠定了客观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记录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的需要增多,档案这一信息载体便应运而生。这使得档案自形成时就镌刻着历史的印记,承载着真实的、原始的历史信息,是社会活动的原始写照,也由此构成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尽管这一属性在随后的认识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或质疑^[15],但质疑性观点并非全盘否定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而是对这一属性的进一步阐释与延展。换言之,档案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已成为业界共识,为其他相关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于原始记录性的理论内涵,如从文本发生学来理解,其一,档案的制作活动(文件的制作活动)和形成活动(档案信息内容相对应的业务活动)是档案形成过程的一体两面;其二,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可靠和档案形成过程的真实可靠决定了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这强调了档案形成过程的社会活动赋予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绝对性,即使在电子档案时代内容和载体逐渐分离的发展趋势下,只要其形成过程是真实可靠的,其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就不会发生改变。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作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的和抽象的属性,使得档案与图书、资料、文物等事物区分开来。

档案的本质属性折射了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社会需要和人的主观意志虽影响着档案的产生,但档案的形成过程是社会活动的必然结果,不能为档案形成者或保管者的主观意志所左右,档案有其

自然形成规律。1962年,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同志在《1958年至1962年全国档案工作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要研究和认识档案的形成规律,按照档案的形成规律来管理档案。”^{[16]210}曾三认为,档案并非随意编写而成,档案的运动周期包括档案的形成阶段、档案室阶段和档案馆阶段。这一观点萌发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强调保持档案的联系性和不可分割性,与档案本质属性所强调的档案形成过程的社会性相辅相成。具言之,档案的形成过程是客观的,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产物。尽管档案的制作活动和形成活动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但档案并非根据人的主观愿望编造而成,档案本身有其固有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保持与维护档案内在的客观联系性,就能正确反映社会活动及其本来面貌。此外,曾三所强调的“档案形成与运动的过程”蕴含了中国档案界对文件(档案)生命过程的最初认识,认为文件从产生形成到归档是一个有规律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不同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文件”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态^[17]。由档案自然形成规律衍生出的有别于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雏形,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强调文件经过立卷归档成为档案、档案不能事后编写、档案具有运动规律等,均是以中国档案工作实践为基础,根植于中国档案工作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传统特色,反映了文件(档案)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是对文件(档案)运动规律的科学阐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一: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承载“历史的记录”,呈现“历史的本身”。这一特质决定了档案区别于其他信息记录,是人类社会最可信、可靠的信息记录。

核心命题二:档案有其自然形成规律,是客观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丰富与拓展。

档案的本质属性及其形成规律是档案价值产生的前提,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是档案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档案价值是档案利用主体和档案客体的统一。档案价值是档案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档案工作实践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一方面,从档案的形成过程来看,档案记载了人类社会活动,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凭证,与其他信息材料相比,具有真实性、原始性的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凭证价值。另一方面,档案记录着历史事件的经过和人类思维活动的过程,承载着相互联系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资源能够满足社会利用需求并对利用者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产生作用,甚至对其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产生影响,这便使得档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即档案的情报价值。但需要认识到,任何价值形态都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档案也是如此。一些档案在产生之初就对社会活动有着行政性、法律性意义,其现实价值在当下便能显现;而一些档案随着保存时间的延续,其现实价值递减,对社会、公民的社会价值递增,这便构成了档案可预见的长远价值。此外,陈兆禄与和宝荣提出的“档案对机关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双重性”,进一步阐发了档案兼具对形成者的价值和对其社会的价值,即“档案作为机关工作和生产的必要条件,在一定时间内,首先是它的形成机关最需要查考利用……档案对于档案形成者的这种作用,是档案形成者积累和保存档案的主要动力”,“作为党和国家的财富,档案的长远作用又不只限于一个机关……社会上各个机关和个人,都需要利用有关档案”^[18]。这区别于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论”^[19],凸显了中国语境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档案双重价值”。正确认识和把握档案的价值形态,对于档案资源建设、档案价值鉴定和档案开发利用具有导向作用。

然而,档案价值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从社会层面看,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对档案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古代社会,档案的获取和利用非常严格,受到社会制度的规训,档案的潜在价值

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档案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有,国家的档案开放政策逐步完善,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明确了档案开放的相关内容,档案的利用范围得以扩大。从档案管理水平看,档案部门提供档案服务、满足利用者需求的能力不断提高,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获取和利用档案的渠道,同时促进了社会整体档案意识的提高,这构成了档案价值实现的条件律。与此同时,随着档案本身价值形态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和档案利用需求的变化,档案价值的实现呈现出一定的转换律、扩展律和时效律。在文件形成之初,其主要服务于本机关的利用,价值主体局限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机密性递减,档案利用主体范围扩大,档案价值得以更广泛地呈现。在这一过程中,档案的作用也表现出多元性的变化特征,从业务工作的信息支持扩展到科学、教育、文化、精神文明等多个方面。但是,档案价值的发挥具有时效性。一方面,不同类型档案价值的时效性不同,如文书档案价值的时效性可能相较科技档案更强;另一方面,档案利用主体的需求也具有时效性,如果某种档案在当时未能满足利用者的需求,这些档案的凭证价值就失去了实现机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的价值及其实现规律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三:档案的独特价值体现在档案的本质属性对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与不可替代性。从二元辩证角度看,档案具有凭证价值与情报价值、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对形成者的价值和对社会的价值。

核心命题四:档案价值实现有其规律性,具体表现为条件律、转换律、扩展律与时效律。

3 基本范畴二: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

档案管理作为社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与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紧密联系。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档案管理经历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三个阶段^[20]。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档案工作的重点是对处于实体状态的档案进行专业性管理,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六个主要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传入我国,计算机技术在档案工作中开始应用。档案所承载的信息与档案实体之间的联系被弱化甚至剥离,业界开始重视档案信息开发,我国进入档案信息管理阶段。2000年国家档案局颁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00),文书文件的归档工作实行“以件代卷”。这一规定顺应了档案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便于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整理。在这一背景下,档案管理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检索和编研两个环节,由此形成了档案管理的八个环节——收集、分类与整理、鉴定、保护与安全管理、统计、检索、编研、利用。21世纪以来,借助数据分析、知识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档案检索、编研、利用得到深化和升级,档案中蕴含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得以进一步挖掘,我国进入档案知识管理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五:档案管理核心环节分为档案收集、分类与整理、鉴定、保护与安全管理、统计、检索、编研、利用八个环节。这八个环节构成档案管理的统一整体。

在档案管理环节,档案收集是第一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三在总结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就提出“收集是起点”的思想,认为“收集是档案工作的起点和基础,没有收集就谈不上利用”^{[16]138}。而建立完善的归档制度对于档案收集的科学和高效至关重要。立足于档案形成的工作实际,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和归档要求均是档案收集的重点关注内容。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电子档案管理的出现,前端控制思想得以提出,档案管理被纳入整个文件运动周期,强调全程统一管理

思想,即“整体规划、业务环节提前、全过程监控”,这进一步说明了档案收集、归档在档案工作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前端控制理念所强调的提前介入思维在各类科技档案管理中得到进一步的凝练和总结,成为中国语境中常说的“三纳入”“四参加”“四同步”,即档案工作纳入组织领导工作议事日程,纳入组织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纳入有关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档案部门或档案人员参加项目竣工验收会,参加设备开箱会,参加科研课题鉴定会,参加有关业务工作会;下达项目计划任务与提出项目文件材料的归档要求同步,检查项目计划进度与检查项目文件材料积累情况同步,验收、鉴定项目成果与验收、鉴定项目文件材料归档情况同步,项目总结与项目文件材料完成归档同步^[21]。“三纳入”是前端控制思维的体制制度保障,“四参与”是档案管理的最佳切入点,“四同步”是全程管理的实施方式,从不同程度上保证档案收集工作的质量。

在档案管理业务活动中,档案分类与整理是维持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有效提高档案资源组织化程度和利用率的重要环节。为呈现档案文件的“历史关联”和“逻辑关联”,我国将档案分类分为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两大类,以建立档案的有机体和档案的信息体系。其中,档案实体分类体现了历史主义方法,是按档案的现实存在状态与界限进行事物的区分,实质上就是对真实的客观档案进行直接认定和把握;而档案信息分类则可同时采用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两种方法并以逻辑主义方法为主,即从档案抽象的性质、特征的异同角度出发,根据分类对象在所选定标准和依据上的相同或相异,划分出若干逻辑概念性的类别结果^[22]。与分类相似,档案整理同样需要基于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进行,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指导下,遵照全宗理论构建档案文件间的历史有机联系,以重构社会活动过程、实现档案信息增值。

档案鉴定则是关乎档案存毁、馆藏优化、档案价值实现的重要工作。古代社会,档案的保存、销毁和利用均为一定阶级所控制;到了近代,由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淡薄和档案管理的不完善,出现“八千麻袋事件”等对档案资源的恶性破坏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鉴定的重要性才被全面认识,并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档案鉴定观。我国在档案鉴定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全面性观点、历史联系性观点等均是辩证法在档案鉴定中的体现,提出的相对价值标准论、价值鉴定论、本位原则理论和档案二元价值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亦是从中国档案鉴定工作实际出发,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性作用。

上述档案管理环节的最终落脚点则是档案利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三即抨击了档案工作“一把锁”的错误认识,强调“一切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档案必须为今天和明天的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16]34}。吴宝康从矛盾论和规律论出发,将档案利用视为档案管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档案利用反映了档案工作的基本规律。到了 21 世纪,为凸显档案利用工作的重要性,2007 年“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正式提出,从战略高度强调档案利用要覆盖全体人民群众、覆盖民族复兴各个方面、覆盖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事业。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档案利用逐渐被技术赋能,智慧档案馆(室)的建设及数据挖掘与智能推送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档案利用形式和方法发生变革,档案价值进一步凸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管理核心环节理论应用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六:归档是档案工作的起点,归档强调前端控制、“三纳入”“四参加”“四同步”,以保证档案收集工作的质量。

核心命题七:档案分类与整理是实现档案资源控制的重要管理方式,分类注重档案的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整理遵照全宗理论,以维护档案的有机联系。

核心命题八:档案鉴定是档案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关系档案的存毁、馆藏的优化及档案价值的实现,强调唯物辩证思维。

核心命题九: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档案观念变革与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档案利用体系的发展。

4 基本范畴三: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经历了四次主要变革。在变革与发展过程中,档案工作基础不断夯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日臻完善,积累了丰富的档案事业管理经验,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鲜明特征。20世纪50年代,我国档案工作处于分散管理状态,机关档案室是档案工作的主要阵地。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中央一级党、政、军、群各机关档案工作第一次座谈会,原则上决定全国党、政、军三大系统的档案实行分工管理,各自建立机关档案室,分别集中统一保管本机关形成的档案^[23]。党、政、军三大系统虽然坚持统一管理的思想和原则,但在档案业务中各有不同的体系。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1954年,国家档案局成立,自此我国档案事业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全国档案工作都应由国家档案管理机关统一、分层进行指导和监督;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决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关于档案工作的行政法规,为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建设和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把党的档案工作和政府的档案工作统一起来是完全必要的。在档案工作统一管理之后,各级档案管理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195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央档案馆,统一保管党和国家的档案。此后,我国党、政档案工作正式实行统一管理,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档案管理的范畴逐渐从党政机关向企事业单位、团体、个人扩展,仅仅将档案管理机构定位为各级党委下的一个部门,难以有效发挥出档案机构的职能,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由此,我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开展了第二次调整。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调整我国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请示》,明确提出实行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原则;国家档案局改归国务院领导,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中央档案馆仍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地方各级档案局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直属局,地方各级档案馆归口各级档案局管理。

20世纪90年代,为响应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我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以职能转变为核心进行了第三次改革。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合并,一个机构挂中央档案馆和国家档案局两块牌子,履行档案保管、利用和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两种职能。与此同时,各地方也根据要求开展机构改革,各部门按照专业系统和档案分类开展档案工作,并受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规范、高效的档案管理体系。实行“局馆合一”使档案局和档案馆的工作职能有机统一起来,加强了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

但“局馆合一”体制也存在不足,弱化了档案机构的服务性和“为民服务”的职能,影响了档案管理机构和文化事业机构的职能区分、职责履行和责任追究,不符合政事分开的组织原则和依法行政的

内在要求,掣肘了档案事业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24]。为弥补这些不足,档案管理体制进行第四次改革。201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吹响了国家层面行政改革的号角,其中强调“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政策,使得全国档案事业改革迫在眉睫。201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档案局、档案馆开始进行机构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此次地方档案机构改革后基本实行“局馆分立”模式,绝大多数地方的档案行政职能划归党委办公厅(室),党委办公厅(室)加挂档案局的牌子,而档案馆成为党委或党委办公厅(室)下属的文化事业机构,部分地方还因地制宜将档案馆和史志办、方志办及其他资料馆等具有相近功能的机构进行了整合。改革从以“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为主导转换为以“局馆分立”的管理体制为方向、从以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为重点转向为以有效发挥档案局馆职能为核心、从以实现档案部门资源的单一整合利用为动力转变为以实现档案职能相近部门资源的综合整合利用为目标^[25]。“局馆分立”是与时俱进的档案机构改革,有利于明晰各自职能与法律责任;实现政事分开,也有利于强化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

在档案管理体制变革和发展过程中,我国档案事业的法治化、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1987年9月5日,《档案法》正式公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档案立法。《档案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确定了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任务,规定了档案的利用和公布办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法》于1996年、2016年和2020年经历了三次修订,对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凝练,为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撑。与此同时,行政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以及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为全国及地方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政策支撑。我国以《档案法》为核心的依法治档工作格局逐步形成。

伴随四次档案机构改革,以档案立法为工作基准,结合档案工作实际,我国逐渐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管理经验。集中制的档案管理体制,在世界档案史上独创了档案工作的新型管理模式,是我国档案事业的一大特色。“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管理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工作改革经验的高度概括,为全国档案事业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提供总原则。鉴于科技档案和各专业工作系统内档案的特点,各专业系统按隶属关系由专业主管机关对所属系统内各单位的档案工作实施管理,是我国档案管理原则的重要补充。至此,以属地管理为主、以行业系统管理为辅的“条块结合”模式成为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管理的重要经验。“条块结合”把“条”和“块”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形成档案工作纵横管理网络^[26],这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纵四横”档案工作格局,即从管理方式和管理内容上形成两条纵向管理主线,在横向上紧密连接地区、行业、专业及系统间的业务工作。同时,根据档案自身的形成规律和客观属性,我国对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和特殊载体档案实施分类管理,将地区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充分考虑到行政管理与业务指导之间的联系,以“条块结合”、分类管理的方法提升档案工作水平,优化档案部门职能,提高档案工作的规范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事业研究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十: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强调依法治档,主要目标是不断提高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核心命题十一: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体系体现为集中制的档案管理体制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管理原则,并形成了“条块结合”、分类管理、“两纵四横”的档案事业管理经验。

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体系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沃土,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档案工作的开展,并表现出坚持文化传承精神、贯穿系统协同观念、符合渐进发展原则与秉承探索创新理念等特点和规律,

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纵观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我国档案工作始终担负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使命。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深刻指明了新时代档案工作“怎么看、怎么做”的重大问题^[27],明确了档案工作“四个好”“两个服务”的目标任务,使中国特色档案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成为档案人的共同追求。实践表明,档案工作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日益突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档案事业发展不断迎来新的发展格局。在稳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继续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社会效用,坚守档案人的初心使命,打造中国特色档案社会服务是时代所需,更是中国特色档案事业所坚守的至高准则。

在诸多中国特色档案社会服务领域中,档案文献编纂和科技档案管理是颇具“中国观念”与“中国精神”的内容。其一,我国自古以来便有“以档修史”的传统,传统档案编纂思想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档案管理体制的变革中,党和国家充分重视珍贵的历史档案,多次组织历史档案的移交、接收和整理工作,将史学传统与档案学的科学管理方法相结合,并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客观需要,结合文献学、信息学及相关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将一切对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信息充分调动出来,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得以增值”^[28],逐渐形成了新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和模式。其二,“科技档案”作为中国特色的专有词汇^[29],是在新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革中逐渐形成的。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的分类研究,也成为中国档案学最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29],立足于发挥科技档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一目的,我国对科技档案的定义、内容、形成过程、形成特点、归档方法和管理技术等进行研究,形成了体系化的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办法,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又指导了科技档案管理实践。由此可见,重视档案文献编纂体现了中国特色档案学深厚的文化底蕴,科技档案管理则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立足于社会实践、批判借鉴国外经验、与时俱进的体现,二者均是中国特色档案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档案事业社会服务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十二:中国特色档案社会服务的落脚点在于“存史、资政、育人”。

核心命题十三:档案文献编纂、科技档案管理是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含中国特色档案学观。

5 基本范畴四:档案学理论与方法

我国档案管理萌芽于夏商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档案工作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往往反映在管理者有关文书或档案工作的法令与规则中,并未形成对于档案工作的系统研究成果,更没有档案学产生的客观基础。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行政效率运动及文书档案改革,掀起了档案管理研究的热潮,为近代档案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民国时期档案思想更多聚焦于档案管理实践,尚未上升到系统性的学理层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密切,在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开始了学习与效仿苏联经验的发展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苏联档案学教材、著作和规章制度引入我国,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学习和效仿苏联的过程中,中国档案学界也对苏联档案学中不适应我国国情的内容进行反思,并坚守“中国化的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理念,由此推动了对

档案概念和基本术语、文书立卷工作、档案本质属性、档案文献编纂、科技档案管理、档案保护技术等多领域问题的“本土化”探讨^[30]。1957年,吴宝康同志提出:“向苏联学习,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向我们国家自己的好传统学习,也是很重要的。”^[31]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以内部资料的形式翻印了部分民国时期档案学著作,后被称为“档案学十三本旧著”。经过对苏联档案学理论和我国“旧”档案思想的反思,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理论建设逐步由被动学习走向主动革新,开启了“本土化”理论探索。1980年,吴宝康提出“要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道路和内容,以及中国式的档案工作现代化的道路和内容等问题”^[32]。1982年,吴宝康又提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要“办出自己的特点,具有自己的特色”^[33]。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档案学理论体系向纵深发展,形成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1986年,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问世,书中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深入阐释。1988年,由国家档案局主持编写、裴桐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出版,系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成就。随后,一大批关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论著深切关照中国本土档案现象,面向中国档案工作实际,探索中国化的档案学学科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1986年,吴宝康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一门一门地研究,再合到一起凑成一个体系的做法”^[34],并依据中国国情与档情,设计了以“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为主体、划分六个层级、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档案事业史”“档案法(学)”“档案术语学”“档案史”“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学”“档案技术应用学”等分支学科在内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总体来看,无论是学习与效仿苏联,还是在反思中发展,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始终是本土化的档案现象,其研究成果是对我国档案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质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十四:中国特色档案学是以中国本土的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自其产生起即强调学科发展的独立化、中国化、自主化。

在档案学理论本土化革新过程中,中国档案界对西方档案学理论进行吸收、借鉴、发展和完善,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核心理论,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这一支柱理论的再审视、再认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全宗”适用范围、“全宗”定义、主客体全宗等问题展开争辩,明确了中国语境下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35]。随着电子档案管理的发展,中国档案界又对全宗理论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探讨,认为全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馆藏单位,而是档案信息组织和运动的基本单位^[36]。20世纪90年代,面对海量电子档案引发的信息流失等问题,国际档案界对档案保管范式重新审视,对来源原则进行“重新发现”,确立了档案后保管范式。1997年,冯惠玲提出“‘后保管模式’指的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37]。由此,档案后保管范式所强调的新来源观为学界所广泛关注。二是在电子档案时代,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价值理论的丰富发展,以及新兴理论形态的形成。由于传统文件生命运动阶段无法准确描述电子档案的形成和运作机理,我国档案学者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展开探讨并形成了“替代论”“不可替代论”和“补充论”^[38]三类主要观点,从文件运动的阶段性、特殊形式、标准化等方面发展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39]。面对电子档案的产生和普及,档案作为知识的价值日益受到关注。1999年,张斌从档案价值现象、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等方面阐述了档案价值论相关内容^[40]。随后,为充分发挥档案作为知识信息的作用,加强对

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知识管理模式应运而生。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记忆”成为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档案界开始对档案的“记忆”属性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独特价值,研究档案与记忆、身份认同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产生并明确阐释了档案记忆观等新的理论形态。“档案记忆观”认为,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41]。这一内涵不仅是从记忆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的系统认知,同时也从档案学视角为记忆及其建构提供了独特认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中国档案学理论革新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十五:结合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与变革,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对来源原则与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价值理论等不断创新完善,对国外档案现象进行中国视角的理论阐释,并发展出了档案记忆观等新兴理论形态。

上述中国档案学理论独立化、中国化、自主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传统档案理论的革新与发展,凸显了中国档案学自产生起即蕴含着“守正创新”的学科特质。这种特质也体现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下诸多学科的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应用^[42]。其中,历史学、管理学、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中日益彰显出方法论价值。具言之,中国档案学自产生之际便与历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史学理论为历史档案的整理与挖掘、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档案与文明、少数民族档案事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参考。而作为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家战略管理、知识管理、集成管理、风险管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渗入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新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思维和实践的影响渐趋深入,社会学与档案学间的互动频繁,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视角审视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对建构社会记忆的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电子档案管理、档案信息化、档案数据治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方法。这种多学科互动和交融的趋势,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丰富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中国档案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

核心命题十六: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奠定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研究方法。

6 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中国特色档案学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档案学四大基本范畴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档案理论、档案实践、档案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塑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骨架。四大基本范畴衍生的档案学十六个核心命题,则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血脉,为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域。

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为档案学研究明晰了研究对象,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诸多专属于档案学领域的研究范畴。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既是历史的记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本身,这种与其他信息载体相比所具有的真实性、可信性、原始性特质,赋予了档案独特的价值形态和档案价值实现的规律性。我国档案学先驱基于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提出的“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不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化了档案的客观属性,更是丰富与拓展了西方国家对档案本质属性的认知及其衍生出的相关理论形态,丰富并拓展了文件生命周期等理论的内涵。“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基本范畴为档案实践层面的研究和档案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奠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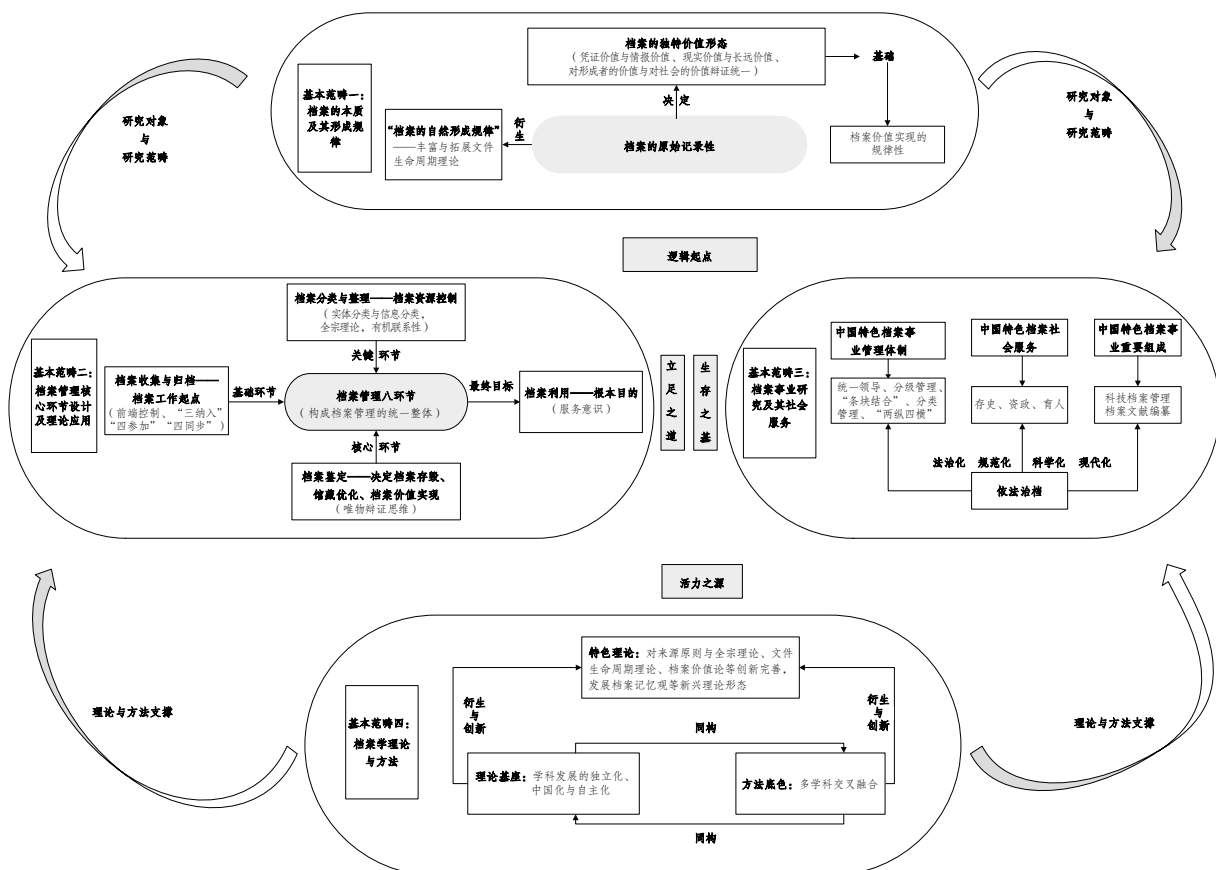


图1 档案学四大基本范畴及其核心命题的内在逻辑

了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立足之道。我国档案学自诞生起即明确了其实践应用性的学科基因,档案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与社会档案现象和档案工作实践密切联系的一门学科。这一学科特质决定了中国档案学要关照档案管理的全流程、关照档案的收管存用等各项环节,为档案工作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导。档案管理八环节是经几代档案人在实践探索和规律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八环节构成了档案管理的统一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的归档环节是档案收集工作乃至整个档案管理的起点,而归档要求做好前端控制、做好“三纳入”“四参加”“四同步”,以保证档案收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这是中国档案工作者总结出的符合中国档案工作实际的管理经验。档案分类与整理是档案资源控制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的档案分类又被划分为实体分类与信息分类,这种二维辩证的分类方法为中国档案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档案整理在遵从来源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遵照全宗理论,致力于维护档案整体的有机联系性,以保证档案的完整有序。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决定了档案的存与毁、馆藏档案资源的优化及档案价值的实现,在借鉴西方国家档案鉴定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强调唯物辩证思维,强调档案的决定性价值和相对性价值的统一。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中国特色档案工作的最终目标即是为党和国家、为人民群众提供利用服务,以实现档案的价值、实现档案工作乃至档案事业的社会愿景。档案管理八环节环环相扣,是中国特色档案实践层研究最富活力的范畴。

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生存之基。中国特色档案事业是依法治档的档案事业,依法治档保证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在依法治档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在集中制的管理体制下,逐渐发展出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条块结合”、分类管理、“两纵四横”的管理经验,丰富了中国特色档案管理体制的内涵与外延。在依法治档思想的规制下,中国特色档案社会服务逐渐走向开放化、社会化,秉承“存史、资政、育人”的宗旨,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档案事业还囊括了一些中国特有的档案实践领域,如档案文献编纂和科技档案管理,经过历史的沉淀,这些领域为中国文化繁荣和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档案支撑。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相辅相成,是中国特色档案实践层研究最富动力的范畴。

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特色档案学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为中国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座、铺陈了方法底色。中国特色档案学是以中国化、本土化的档案对象认知和档案管理实践为基础的,自始至终即蕴藏着独立化、中国化和自主化的理论基因。但中国特色档案学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在不断“向外”延展中守正创新的,在这一过程中,档案学注重吸纳多学科的方法和特色,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将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我所用”,不断丰富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此外,中国特色档案学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不断自我更新,形成了富有中国化的特色理论,并对既有理论突破创新,形成了中国档案学的自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7 结语

中国特色档案学是在中国社会全方位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科。顺应社会变迁,立足社会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学科体系与内涵,方能促使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永葆活力。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时代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中国式档案现代化时代命题中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知识体系,成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发展的新命题。唯有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进程,明确其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以发展的、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特质与偏弊,才能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以自我革新铸就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全新面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梁继红.从“附庸”到“独立”:中国现代档案学初步建立及其学科属性的历史分析[J].档案学研究,2022(3):4-12. (LIANG J H. From being subsidiary to independent: historical 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nd its nature[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22(3): 4-12.)
- [2]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五卷)[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21. (Periodical Office of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Classics of archival science (volume 5) [M].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21.)
- [3] 张斌,杨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19(5):4-12. (ZHANG B, YANG

- 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19(5): 4-12.)
- [4] 张斌, 杨文.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5): 68-78. (ZHANG B, YANG W.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evolution logic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20(5): 68-78.)
- [5] 潘连根. 关于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反思[J]. 浙江档案, 1999(9): 15-17. (PAN L G. Reflection on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archives science[J]. Zhejiang Archives, 1999(9): 15-17.)
- [6] 罗力. 档案学研究方法研究述评[J]. 档案与建设, 1994(12): 7-9. (LUO L. A review of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J]. Archives & Construction, 1994(12): 7-9.)
- [7] 傅荣校. 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研究之述评[J]. 浙江档案, 1997(7): 18-19. (FU R X. Review of Chinese archives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J]. Zhejiang Archives, 1997(7): 18-19.)
- [8] 陈永生. 努力提高档案学在学术界的地位[J]. 档案, 1996(2): 17-20. (CHEN Y 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aise the status of archival science in academic circles[J]. Archives, 1996(2): 17-20.)
- [9] 何振. 论中国档案学的危机——中国档案学的出路探析之一[J]. 湖南档案, 1998(3): 10-12. (HE Z. On the crisis of archives science in China—one of the ways of archives science in China[J]. Hunan Archives, 1998(3): 10-12.)
- [10] 连志英. 中国当代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J]. 档案学研究, 2019(2): 31-35. (LIAN Z Y. The cris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val studies[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9(2): 31-35.)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2.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5)[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9: 32.)
- [12] 伯特兰·罗素. 意义与真理的探究[M]. 贾可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60. (RUSSELL B. The search for meaning and truth[M]. JIA K C,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160.)
- [13] 王颖斌. 命题之作为变式——海德格尔论科学命题的渊源[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2(2): 51-55. (WANG Y B. Statement as a derivative mode——HEIDEGGER on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statement[J].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2): 51-55.)
- [14] 王英玮. 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思考[J]. 档案学通讯, 2001(2): 32-35. (WANG Y W.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rchive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 2001(2): 32-35.)
- [15] 黄夏基, 古琼梅. 档案本质属性新说[J]. 档案学研究, 2022(6): 25-31. (HUANG X J, GU Q M. A new theory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archives[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22(6): 25-31.)
- [16] 国家档案局. 曾三档案工作文集[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0.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ZENG San's archives work collection[M]. Beijing: Archives Press, 1990.)
- [17] 王恩汉. “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讨论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形成的影响[J]. 档案学研究, 2001(6): 3-6. (WANG E H.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cussion of “law of natural formation of archives”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archives science in China[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01(6): 3-6.)
- [18] 陈兆祯, 和宝荣. 档案管理学基础[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30. (CHEN Z W, HE B R. The basis of archives management[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86: 30.)
- [19] T·R·谢伦伯格.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 黄坤坊, 译.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3: 22, 144, 151, 160. (SCHELLENBERG T R.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modern archives[M]. HUANG K F, trans. Beijing: Archives

- Press,1983:22,144,151,160.)
- [20] 徐拥军. 企业档案知识管理模式——基于双向视角的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 (XU Y J. Enterprise archives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based on dual perspective research[M].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12:9.)
- [21] 刘金霞. 企业档案工作“纳入”、“参加”、“同步”的思考[J]. 档案学研究,2010(3):13-16. (LIU J X. The plural thinking on taking-in,engagement and synchronism in enterprise archives management[J].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0(3):13-16.)
- [22] 张辑哲. 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72-75. (ZHANG J Z. The way to maintain: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M]. Beijing:China Archives Press,1995:72-75.)
- [23] 国家档案局. 中国档案年鉴1989[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24.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hinese archives yearbook of 1989[M]. Beijing:Archives Press,1992:24.)
- [24] 徐拥军,张臻,任琼辉. 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特点与方向[J]. 档案学通讯,2019(1):15-22. (XU Y J,ZHANG Z,REN Q H.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process,characteristics and direction [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19(1):15-22.)
- [25] 徐拥军. 省级档案机构改革的特点、影响与展望[J]. 求索,2019(2):74-80. (XU Y J. Characteristics,influence and prospect of the reform of provincial archives institutions[J]. Seeker,2019(2):74-80.)
- [26] 罗军. 中国档案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研究[M].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35. (LUO J. Research on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China[M]. Shanghai:Shanghai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2011:35.)
- [27] 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批示精神 努力开创档案国际交流合作新局面[EB/OL]. (2021-11-11)[2023-03-07]. <https://www.saac.gov.cn/daj/gjjldt/202111/3b2d194ded13454891747035ca5716b9.shtml>. (Study and implement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nd strive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archives[EB/OL]. (2021-11-11)[2023-03-07]. <https://www.saac.gov.cn/daj/gjjldt/202111/3b2d194ded13454891747035ca5716b9.shtml>.)
- [28] 韩宝华. 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兼评张关雄主编的《编研工作概论》[J]. 档案与建设,1997(4):13-15. (HAN B H. Striving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archival document compilation—comments on ZHANG Guanxiong's *Introduction to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J]. Archives & Construction,1997(4):13-15.)
- [29] 王恩汉. 科技档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观[J]. 湖南档案,1997(1):9-11. (WANG E 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a view of archives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Hunan Archives,1997(1):9-11.)
- [30] 闫静. 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73. (YAN J.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66:c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M]. 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2021:73.)
- [31] 吴宝康. 努力发展档案学[J]. 档案工作,1957(2):16-19. (WU B K. Make efforts to develop archives science [J]. Archival Work,1957(2):16-19.)
- [32] 吴宝康. 三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续)[J]. 档案学通讯,1981(3):2-21. (WU B K. Research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since the latest thirty years (continued)[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81(3):2-21.)
- [33]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三十年[J]. 档案学通讯,1983(1):16-25. (Archives Department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rty year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J]. Archives Sci-

- ence Bulletin,1983(1):16-25.)
- [34] 吴宝康. 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J]. 湖南档案,1986(5):6-9. (WU B K. Archival science and its subject system [J]. Hunan Archives,1986(5):6-9.)
- [35] 冯惠玲,何嘉荪. 对全宗理论的反思——全宗理论新探之一[J]. 档案学通讯,1988(4):9-13. (FENG H L, HE J S. Reflection on whole file theory—a new exploration[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88(4):9-13.)
- [36] 何嘉荪. 论全宗形态的异化——电子文件时代还有全宗吗?[J]. 档案学通讯,1998(2):18-21. (HE J S. 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form of whole file theory—is there still whole file theory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documents?[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98(2):18-21.)
- [37] 冯惠玲. 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摘要之六[J]. 档案学通讯,1998(6):46-50. (FENG H L. New thinking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documents—Have a New Memory—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Research abstract 6[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1998(6):46-50.)
- [38] 傅荣校,靳颖. 文件整体运动描述:是文件生命周期模式,还是用文件连续体模式?——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问题研究之三[J]. 档案管理,2008(3):7-12. (FU R X, JIN 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movement of records;model of records life cycle or model of documents continuum?[J]. Archives Management,2008(3):7-12.)
- [39] 张斌,尹鑫. 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6):36-49. (ZHANG B, YIN X.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21,47(6):36-49.)
- [40] 张斌. 档案价值论[J]. 档案学通讯,2003(3):43-46. (ZHANG B. Theory of archival value[J]. Archives Science Bulletin,2003(3):43-46.)
- [41] 徐拥军. 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84. (XU Y 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chival memory view[M].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17:84.)
- [42] 冯惠玲,张斌,徐拥军,等. 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进展[C]//中国档案学会. 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6-66. (FENG H L, ZHANG B, XU Y J, et al. Advance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archives science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C]//The Society of Chinese Archives. Innovation:Arch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Work in 2014. 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2014:6-66.)

徐拥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闫 静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2023-03-24;修回日期:2023-05-16)